



村里的老房子。

住房的变迁

老照片

裘七曜

我的案桌上放了一张黑白照片，那是我们一家人的合影，拍照时间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可以看到清冽的青菜。除了父母亲，我们每个人的脸上笑嘻嘻的，因为我们的后面是三间平房，这三间房是刚刚建成的。人生一世，添砖加瓦，每个人都做着住新房的梦想——结婚二十多年的父母，在养育子女的同时，终于有能力建房了。尽管他俩看上去表情凝重，但我想，内心肯定也是无比欣慰的，只是个性使然，不愿意在子女面前表露出来吧。

在此之前，我们住后楼，那是历经100多年的老楼屋，四间两弄一敞堂，住了三户人家，二十多口人。由于年代久远，木头房子看上去总是黑乎乎的，潮气又大，而且特别会漏雨，如果雨稍微大点，墙外的水宛如“万千喷泉咕嘟咕嘟直往家里涌……”汪洋大海里会漂浮着许多小船——什么木盆啊，拖鞋啊，在屋里头横冲直撞。我们编了个顺口溜，“阿拉屋落在后楼，四处凉棚洞眼大。狂风暴雨一到家，屋落总是喇喇响。”家里的地是泥地，我们经常用一枚长长的钉子在地上划来划去，玩一种叫“炸碉堡”的游戏。

家门口的道地宽有2米多，也被父母亲利用起来了，搭了个猪圈，边上的缸里放满了猪吃的饲料，什么烂草籽、革命草等。那时，我家人口多，四个姐姐“占”了楼上的两张床，父母亲加我和弟弟就没地方睡了。后来，父亲在灶台后楼梯旁用竹片抹黄泥当墙，弄了一个小房间出来，正好可以放一张床。四个人挤一张床，想转身都很难。而楼梯下还放了便桶、鸡笼，时常臭气熏天，有时雄鸡夜鸣，我也只能“闻鸡起舞”。

自然，当时各家状况差不多，人畜同在屋檐下。我常听父母亲在嘀咕：“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大，咱得想办法建房了……”

为了建这三间平房，父母亲煞费苦心、起早贪黑。首先找会打石头的壮实汉子在山脚下的石



20世纪80年代一家人的合影，背后是新建的三间平房。



村里的新房子。

窟里打炮眼塞炸药，炸开以后，用八角榔头把大石头敲开，然后挑下来再用手拉车拉回家。为了节省砖头，地基上的石墙砌成了一人高。接着便是一家老小空闲之时全出动，挖泥、踩泥，做泥砖，有一首歌这么唱：“今天打砖，明天打砖，不知何时才可以休……”

泥砖晒干了，便上山斫柴，当时大家都叫“斫柴”，因为泥砖在窑里要烧好长时间，所以斫来的柴堆积如山。

当时，在乡村起屋造房子这样的大事，均是帮你我，我帮你你，乡里乡亲的，管饭给烟不收工钱，美其名曰：做伙工。

这些事情搞定后，剩下的就是备木料了。而伐木需要向村里申请，审核通过后，拿着山林委员会的批条才能上山伐木。当然，山林中的树木也不是随意可以砍伐的，村里有专门负责砍树的人。

我家房子的木柱子看上去还行，而边上有户人家的两根屋柱看了叫人忍俊不禁：一根像驼背的老人，另一根宛如弯弓射大雕。没办法，那时山上的直树寥寥无几，如同世间难逢百岁人。

因为这三间平房在路边，路过的人总会驻足观看，啧啧赞叹。尤其是屋后大山中岭头村的人路过我家，更是连声夸赞，说这样的房子才叫房子，院子又大，住着肯定舒服。

父亲说，等以后娶媳妇的时候，这三间平房给我当婚房。可是，时代变化太快了，到

了20世纪90年代初，那些富起来的乡亲，开始建砖瓦结构和采用水泥板（空心板）的楼房了，我们俗称“二层楼”或“三层楼”。此时，我们家曾经风光无限的三间平房，已是黯然失色，不值一提。

父亲说，“咱家也得把楼房建起来，否则，你小子娶不到媳妇了。”说干就干，三间平房被扒倒，临溪而建的二层楼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眨眨眼长大了长高了，在春风里蓬勃着，令人满心欢喜。当我站在自家的阳台上举目远眺，能看到蓝色的大海和帆影——名副其实的海景房呢。

到了1999年前后，口袋里鼓鼓的乡亲们更显得野心勃勃，“洗脚上田，设法赚钱”，大家奔向城市，并打算在城里买房了。当时，他们的身份有点尴尬：城里人把他们看成乡下人，而农村人又羡慕他们成了城里人。

弟弟那个时候在城里也买了房。当时他参加工作不久，并无多少积蓄。老父亲发话了：你们都已成家，可你们的弟弟还没有合适的房子，帮他吧。那时，四姐手头有点钱，带头拿出2万元借给弟弟，而我们多多少少也各出了一点。弟弟气吞山河般进城了。

2009年的春天，进城已有10多年的二姐来乡下看望母亲。二姐一边忙着洗菜，一边悄悄地告诉我和妻，她又在城里买了一套房，问我们买不买。我和妻对视了一眼，异口同声：买！

后来，我们也搬到了城里，和二姐成了邻居。

在小区里，我常见二姐用推车推着她的小孙子在绿树下跟熟人聊天。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是二姐把我抱大的，我跟她差10岁，为了带我，二姐辍学了。

2019年秋天，我和二姐所住的小区要拆迁了。那些时日，小区里大家见了面总是聊拆迁这个话题。二姐说，拆迁还是好事，政府肯定会给老百姓一些实惠，而且我们以后居住的新小区各方面设施会更好。

2022年春天，二姐约我去看我们以后的“新家”。我和二姐边走边聊，她说，新小区有15幢高楼，楼和楼之间的距离比较合适，日照足够。而楼下花草和树木也已经种好，悦眼养心。新小区离地铁站不远，而且小区的后面有条弯弯的河，是县江的分支。河的后面有块偌大的空地，听说以后还要建一所中学和一所幼儿园。空地的后面是狭长的小山，望过去有茂林修竹，听说以后要在山上建公园……姐姐快乐如风，我的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而回过水来看乡村，发现乡村也在大放异彩。“天蓝、水清、树绿、花香”，条条大道到村口，社区医院、健身场地、小型超市等应有尽有。别墅式的小楼越建越多，新农村“示范房”拔地而起，屋前有清澈的流水，有别致的小桥，有崭新的马路，有阵阵花香，有白鹭飞翔，有东风染尽田野的喧腾和美丽。

站在春天的路口，目睹这日新月异住房变迁和人们生活的日新月异，自是心生感慨。我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年轻的身影，真想悄悄地在草地上打几个滚。

“繁花”丛中 风尚流转

道老古

林亚玉

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讲述了众多上海人的故事，有人就有衣着，旗袍、裙子、中山装、西装、棉袄、运动装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繁花》让读者看到了上海的时代特色，看到了都市服饰的前沿性和传承性，更从中看到了那个时代普通都市人的审美观念。

着花旗袍，前襟掖一条花色手帕，是20世纪50年代祖通文墨的民办教师的打扮。喜欢跑舞厅的女士，旗袍特别多，“单、夹、呢绒旗袍，闪面花缎，四开纺绸，平头罗纺，竖点缎绸……每一件，腰身绝细，样式不一样，滚边包边，暗扣，挖镶，盘香扣，看似简单，实在是妖……”还有“沙克司坚”旗袍，也就是人造丝，绿、黄、粉、淡蓝、雪白。当时男人着白西装，女人着白旗袍，最为流行。

裙子也是上海女性喜爱的服饰，用蚕丝织成做的，称为“摹本缎子裙”，这是上档次的裙子。着在S身段的女士身上，妩媚夺目，添一分大草，减一分大素。1974年，流行V字领的左右对称的连衫裙：小和尚领，领子和前襟的边缘镶布，腰间抽褶，并配上一条本色腰带，腰下是半长裙，裙子的下摆在小腿中部。此裙在上海的流行时间较短，很快被新的其他上海特色裙所取代。米白色的“铅笔裙”清爽而舒适，富有特色的百褶设计让简单的铅笔裙富有层次感。与此类同的“一步裙”，端庄、文雅，最受机关女性青睐。

中山装，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身份象征的男士服饰。上海“红帮裁缝”是缝制此类服装的高手，孙中山第一套中山装即出自“红帮裁缝”之手。他们不仅缝制新衣，还有改制长袍马褂为中山装的技术。

到了20世纪80年代，港台的服饰风吹到上海，喇叭裤、牛仔裤、弹力衫，在年轻人中颇为流行。男青年穿着铜钉的劳动布裤子，搭配圆领汗衫，显得很酷。女青年穿的弹力衫是花色的，“弹力衫慢慢套上去……逐渐裹紧，两手朝下一拉，衣裳有了精神，平滑、皱褶，隆起，收缩，服帖自然。”

一部《繁花》，几多服饰。我当年也曾服饰穿搭上跟过风，回忆往事，感慨万千。



电视剧《繁花》中的男女服饰。

去看百梁桥

乡愁

仇赤斌

百梁桥在海曙区百梁桥村。百梁桥村是大村，昔日逢农历初五、初十，街上有集市，宁波人称之为“市日”。小时候我跟着母亲去百梁桥赶集，菜贩集中在北街摆摊。附近有供销社、杂货店、理发店、服装店等，我常常跟随母亲来这里买菜、理发。

北街的尽头就是百梁桥。那时桥上可以开拖拉机，桥头有水泥斜坡。后来为了保护古桥，禁止机动车通行，桥头变成了台阶，还在古桥的东侧新建了一座水泥桥，可以行车。母亲常常带着我和姐，走过百梁桥头，步行去鄞江的外婆家。

我在百梁桥小学读过几个月书，小学在桥的北岸。我们村和邻村的梁桥小学，都不是完全小学，四年级起就到百梁桥小学读书。新到一个地方，学生多了，校园大了，有点志志。我勉强算是好学生，但很不适应，不久转学去了乡中心小学。

去年6月，途经百梁桥村，我特意去看了老街和古桥。

长长的老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原先供销社位置上的建筑是新的，看着像是拆后重建的。南北向的老街，依旧破落，街上少数是砖混结构建筑，大多是砖木结构。二楼外墙是木板，有的还残留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标语。底楼是店面房，店面用的是镶了铁皮的木板，可拆卸。当年这些店铺生意红火，如今大多关门了。

去看了百梁桥。桥头立着两块石碑，1982年的鄞县文保单位碑和2005年的浙江省文保单位碑。因为雨水的浸淫，显得斑驳，有了历史的厚重感。石碑如此，何况近千年的古桥呢！

百梁桥是宁波十佳名桥之一，横跨鄞江之上，始建于宋元丰元年（1078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

是浙江省最长的石墩木梁古廊桥。桥全长77.4米，宽6.18米，六墩七孔，桥上有瓦屋廊桥。因桥梁由124根大杉木架设而成，故曰“百梁桥”。它气势宏伟，结构完整，是研究古代桥梁的难得实例，被称为“浙东第一廊桥”。

桥南另两块石碑。一块石材红色，另一块黄白相间，碑上镌有“重修光溪百梁桥记”，时间为清嘉庆七年（1802年），距今也有200多年了。

站在古桥的西南侧，能看到桥的全貌。六个硕大的淡红色石墩承载着黑色的廊桥，敦厚又沧桑，像一条卧着的巨龙。桥的南面有好几棵古树，是我以前没注意过的。据铭牌上记载，朴树的树龄有210年，枫杨有160年，都是浙江古桥名木。

我走在桥上，仿佛走在旧时光里。木柱和木梁都被油漆一新，但桥板是旧的，表面凹凸不平。桥的中央有几间木屋，分别是龙王殿、三官殿、文武殿、观音殿、土地神殿、财神殿，是2002年当地村民集资修建的。据说是恢复旧貌，但我儿时并未见过这些。横板上坐着几位长者，时不时闲聊几句。桥，不仅是连接两岸的通道，也是他们的社交场所。桥的北岸被封了，因为那里正在建设防洪用的鄞江江堤工程。百梁桥的高度不够，江堤工程到了此处，只能改道，另建一段河道。百梁桥的东西两端各保留一段河道，以后这座古桥可能会失去实际功用。

2024年春节，我从老家罗家漕出发，沿着新修的鄞江堤岸大道，步行走到百梁桥。路况很好，两岸的风光不错，感觉很快就到了桥边。整治工程，除了百梁桥附近，基本完工了。而百梁桥仍安静地卧在水中，像一条黑龙，一派岁月静好的景象。感慨很多，于是写下一首《菩萨蛮》：

当年少读诗书早，如今常忆学堂好。群鸦路走难，无暇春景看。 群鸦栖老树，夕照江堤路。又见百梁桥，仍如黛色蛟。

小摆件中日月长

慢时光

蔡体亮 文/摄

听长辈说，潘火桥的老屋建成于1926年，因地处村子东头，被称为“东头新屋”。那时，祖父在“新丰”轮上“撑船”（宁波人称海员为“撑船”），每年有一个月是航行于沪甬之间的。其实，这房子造好后，住的时间不长，祖父及家人长期居于沪上。祖母生前常提及当年将许多家具从上海带到宁波的事。这些家具我都见过，包括镶嵌的甬式凉床。看来，当时在上海买甬式家具是方便的。

现在放在家里的几件陶瓷小摆件，亦是潘火桥老屋里最初的陈列物品。当然，还有更早的，如一只水仙花瓷盆，瓷盆上印着农历年份，大伯说是1918年之物。1968年5月，我从宁波把它带到上海；1984年10月，我又将它带回宁波家中。其他壁挂等小摆件，也均有从甬至沪、许多年后又重归故乡的经历。

两个壁挂似拟鱼的半圆竹篾，黄色的竹篾颈上缠着葡萄的枝蔓，绿叶及下垂的果实，枝叶间还趴着一只米色的小老鼠。两个壁挂应为一对，我将它们分别挂在客堂间紫红色的屋柱上。过去，砖木结构的老屋有其便利之处，在屋柱上敲个铁钉，即可安置壁挂，里面可插上鸡毛掸子等物。后来搬迁至水泥房子，我预先在墙上埋下两个小木桩，才能放置壁挂。另一个虾状壁挂，是从老屋的大灶头翻出来

的，我将它挂在中间的屋柱上。许多年前，一个收购旧物的中年人路过我家门口，看见客堂间里的虾状壁挂，即要出价收买，说可转卖给影视剧组。我说老屋旧物，日久情长，怎会舍得卖掉。这一类陶瓷器，应是江西产的，因为家中的一些盘碟底下多有“九江”字样。记得祖父说过，“新丰”轮为浅底船，不但可航海，亦可在长江上航行。

儿时到老屋中还见过不少陶瓷摆设物品，如“渔、樵、耕、读”四人物、“五子罗汉”等。现还保存着一个有柄的陶瓷酒杯，杯子上的图案为一古代老翁坐于柳树下，身后是一箱书籍。我猜想或是陶渊明吧。另一面印着“己未秋月”，中间是祖父的姓名，落款是一个“制”字及一个椭圆形的小红印。酒杯是祖父当年定制的，想起便觉得亲切。父辈说，他们小时候，算好祖父工作的那艘轮船回来的时日，即去黄浦江边的新开河码头等候。我常想象当年情景：岸边的几个小孩翘首以待，轮船慢慢地靠上码头，大人和小孩相互招着手，然后欢欢喜喜地一同回家。

有一个骑在红鲤鱼上的“瓷娃娃”，眉目如百年前杨柳青年画中的稚童，是从上海带到宁波的，我将它摆在台钟旁，一放就是40年。还有一个笔洗，也是从前旧物，赤身幼童扑在一个似“佛手”的果实上。从牙状的曲口看，将它当作往砚台上注水的器物亦可。这些都是从前我们宁波人家中很有情趣的传统摆设件。



鱼篓状壁挂

幼童佛手笔洗

幼童红鲤鱼摆件

虾状壁挂

另有一个玉白色的笔洗，敞口浑圆，纹路古朴，放在书桌上，煞是可爱。笔洗是岳父过去从上海带到宁波家里的。听岳父说，1932年他从宁波到上海“学生意”，当年还不满14岁。后来在沪上外贸公司工作，单位地址在当时的“朱葆三路”，后改名为“溪口路”。当年从上海回宁波探亲，总要带上一两件陶

瓷小物品。我见过的有“水蜜桃”陶器，配有绿叶，一拳大小，甚是讨人喜欢。还有六角的金边纹浅底盆，手掌大小，大概是用来磨墨蘸水的。岳父生前还给我看过他们公司员工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南京路永安公司屋顶花园的合影。